

牡丹社事件的源起

文／林呈蓉（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圖片提供／央圖臺灣分館



◀牡丹社討伐版畫縮圖。

1874年6月明治政府派兵征臺，目的是懲治殺害琉球漂難民的臺灣原住民，日本史稱之為「臺灣出兵」或「征臺之役」；臺灣史則稱之為「牡丹社事件」，因為當時人們誤以為引發

事端的是牡丹社原住民，其實真正加害者應是高士狷社原住民。

1871年10月18日，兩艘宮古島船與兩艘八重山船完成對琉球王國繳交年貢的義務後，回島途中遇暴風雨侵襲，其中一艘宮古島船與兩艘八重山船被暴風吹走宮古島船隨海流漂到臺灣島原住民蕃界處，一艘八重山船幸運的漂到受清廷管轄的臺灣府城，另一艘則行蹤不明。

隨海流漂到臺灣的宮古島船，成員上岸地點是現在臺東縣滿州鄉沿海八瑤灣一帶，這艘船原有69名乘組員，在上岸過程

中有3名成員不幸溺斃。「牡丹社事件」發生後，一般多以為受害者是漁民，從遇難者名簿上頭銜可確知，他們大多數是宮古島的政府官員以及幾位當地的土族與商人。

66名漂難民上岸後，原欲尋找附近人家協助，結果巧遇兩名漢人，並跟著一路同行。但途中兩名漢人強行奪取他們身上重要物品，入夜後又強逼他們擠到一個小洞穴過夜，一行人愈想愈不安，便自行離去。兩名漢人曾對他們說，往西走會遇上有馘首風俗的「大耳人」，只可往南走。然而他們對兩名盜匪行徑的漢人不再信任，眾議

後決定還是往西走。而後一行人迷了路，途中雖一度改往南，最後還是遇上大耳人。

八瑤灣介於南邊的九棚溪與北邊的馬農望溪間，即今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溪一帶，漂難民原往九棚溪方向走，後又折返往馬農望溪方向的山路行進，誤闖大耳人部落。漢人所說的大耳人，其實是高士狷社（或說「高士佛社」）原住民。高士狷社原住民因習慣耳垂上穿孔，並戴上貝殼加工飾品，漢人便稱他們大耳人。

高士狷社的部落有茅屋十五六間，從聚落規模觀之，算原住民部落中比較大的。高士狷社原住民雖提供吃住給漂難的宮古島民，但也把他們身上的剩餘物品

搜括一空，這個舉動令漂難民更心生恐懼。有一天，族人要去打獵，臨行前告知漂難民在他們回來前不可擅自離開，只派幾名人員留守。漂難民眼見大部分大耳人走遠了，便兩三人一夥，避開看守人視線，試圖逃離部落，並約定一處集合。等大夥兒到齊後，漂難民繼續往前走。一行人在雙溪口遇上一名漢人老翁陵老先，乃向老翁尋求協助，並在其住處稍作休憩。陵老先是專門從事原住民產品交易的貿易商，一行人原以為可以得救，不料大耳人追殺過來，強行剝取他們的衣服、髮簪，還揮刀要殺他們。漂難民眼見事態不妙，四竄逃逸。他們以為，大耳人是為了吃人肉，

或取人腦漿作為藥用而殺人。

漂難民一行66人中，有54人死於原住民刀下，一名被生擒；9名躲在陵老先寢臺下以及兩名逃到山裡的漂難民，總算躲過一劫。第二天，陵老先打算把九死一生的11名漂難民送至清廷管轄下的臺灣府（臺南）保護，輾轉聯絡保力庄的楊友旺父子前來協助。楊友旺以肉肉向原住民交換被生擒的漂難民後，連同躲在陵老先家中的11名，讓長子楊阿才帶他們從車城灣經海路到枋寮，再從枋寮走陸路經東港、鳳山，進入臺灣府。最後僥倖生還的12名漂難民，從臺灣府被護送到福州琉球館，當他們被送回那霸時，已是隔年（1872年）的6月2日。

臺灣學系列講座56

主講人／鍾淑敏（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南方進行曲——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

對當代臺灣人而言，藉著頻繁的旅遊或傳播，或活躍於各地的「臺裔」活動，對於東南亞的風土、景觀並不陌生。而對於在臺灣各地可見的有關「東南亞」的種種，可能浮起什麼影像？是工地現場、工廠裡的外勞、代號「瑪麗亞」的家庭照護幫傭？越南新娘？滿街的泰國料理？還是假日聚集於中山北路的人群？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要素」，成了當代臺灣人常見的「東南亞」印象。

上述這些可能是我們當今

所認識、感受到的「東南亞」，儘管「東南亞人」生活於我們周遭，但我們可能對他們所知甚少。在學校教育中，以往在歷史課本上除了以朝貢的身分，或者鄭和下西洋中的國名出現外，基本上這些南方近鄰國家不是我們學習的對象。然而，在「東南亞？」大量存在於臺灣的現在，我們豈能仍然冷漠！

1990年代以來，政府曾經大力提倡「南向」政策，希望臺灣產業不要過度依賴中國市場。與此相對的，則有所謂「大膽西



▲鍾淑敏。

進」的說法，鼓勵臺灣企業前往中國大陸。

這兩個看似不同發展方向的爭論，並非始於1990年代，早在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便已經預定了臺灣在日本往這兩個方向前進時的位置。當時，臺灣總督府將對外關係的主軸定位為「南支」（華南）、「南洋」（東南亞），將此稱為「對岸政策」或

「南支南洋政策」。與當代提倡「南向」或者「西進」不同的是，這兩個方向基本上並不相排斥，只是在日本帝國對外擴張的過程中，臺灣所扮演角色的輕重有別。

臺灣總督府與華南、東南亞關係，學者將它分成四個時期，即1895至1914年的搖籃期、1914-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南進熱時期、1923-1937年的沉滯期，以及1937-1945年的追隨日本南侵的四個階段。不過，所謂「南支南洋政策」涵蓋的兩個地域，畢竟是全然不同的兩區，對總督府而言，此兩區域的意義並不相同。

華南一帶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大多數前往大陸的臺灣人

（當時被稱為臺灣籍民）聚居之處，從文化、地理及中日雙方的政治關連而言，很自然的會有治安上的顧慮。而南洋與臺灣地理上相隔較遠，主要為列強的殖民地，臺灣籍民的人數也遠不及日本人多。基於種種差異，總督府政策的施行自然也有所偏重。

在總督府推行「南支南洋政策」時，臺灣人不必然扮演最重要、最積極的角色，然而，從臺灣史來看，這個時期對臺灣人而言，又帶來、遺留下什麼？是華南銀行、錦記茶行在爪哇的擴展？是臺灣人醫師的醫療活動？或軍夫、軍屬與戰爭傷痕？華南與東南亞對當今的臺灣人而言，戰前、戰後似乎是兩個不連續的斷代；然而，在臺灣人以「臺

商」身分重新進入「南支南洋」的今天，過去的歷史果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回顧過去，重新檢視戰前臺灣與華南、東南亞的相互關係，檢討日治時期在臺灣總督府南方進行曲的吹奏下，臺灣以及臺灣人在華南、東南亞的海外經驗與其戰後影響，應當仍有其現實意義。

臺灣學系列講座預告(57)

●八田與一與嘉南大圳

主講人：陳鴻圖（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講座時間：5月14日（星期六）

上午10時~12時

講座地點：央圖臺灣分館四樓

4045教室

洽詢電話：(02) 29266888

轉 4221 余小姐